

DOI :10. 14015/j.cnki.1004-8049. 2016. 9. 009

张萌、刘相平：“台湾‘台湾史’研究谱系及其史观嬗变述论”，《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9期，第74-85页。

ZHANG Meng, LIU Xiangping, “The Pedigree of Taiwan Scholars in Taiwan History Research and the Evolutions of Their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Pacific Journal*, Vol. 24, No. 9, 2016, pp. 74-85.

台湾“台湾史”研究谱系及其 史观嬗变述论

张萌¹ 刘相平¹

(1. 南京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2014年2月10日,台湾当局公布新的普通高级中学语文及社会领域课程纲要,简称“103课纲”,在台湾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其实质是“中国史观”和“台湾中心史观”两种不同史观之争。台湾史学界最初由“中国史观”主导,随后逐渐被挑战和“边缘化”,最后“台湾中心史观”盛行,导致“台湾史”研究界的普遍“本土化”,这背后有着复杂而深刻的政治社会原因,而“台湾史”研究谱系的“继承与断裂”则直接影响到“史观”的变化,也对高中历史课纲的修订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关键词: 台湾历史课纲;“台湾史”研究谱系;“中国史观”;“台湾中心史观”

中图分类号:K291/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6)09-0074-12

2014年2月10日,台湾“教育部”正式公布新的普通高级中学语文及社会领域课程纲要(以下简称“103课纲”),在台湾引发广泛争议,其背后影响因素众多,包括政治因素、社会因素等。其中,历史科课纲引发的争议最大,之所以如此,除了上述因素外,台湾的“台湾史”学界内部“中国史观”与“台湾中心史观”的分歧与斗争是重要原因。

本文拟从台湾历史课纲的嬗变过程入手,探析台湾的“台湾史”学界的谱系及其史观变迁,并剖析其产生变化的原因。

一、台湾历史课纲变迁中的历史学者

历史教育是形塑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尤其在年轻人的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处于特殊的政治环境,战后台湾历史课程和历史教科书更是扮演尤为重要的角色。1945年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实行“去日本化”、全面中国化的政策,历史教科书成为官方掌握意识形态、构建国族想象的必要工具。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以前,各地均采用“国立编译馆”统一编修的教科书,以“中

收稿日期:2016-03-02;修订日期:2016-03-30。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香港高校现代大学制度研究”(13YJAGAT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萌(1989—),女,江苏连云港人,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台湾史、当代台湾研究等;刘相平(1969—),男,江西吉安人,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师范大学两岸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当代台湾研究、两岸关系研究等。

国”为叙述主体,希望学生能够通过学习以“明了中华民族之演进及各宗族间之融合与相互依存关系”,^①倡导国家主体性和民族精神。蒋经国去世、李登辉上台后,台湾“课纲”的调整成为常态化工作,也因此成为各种学术立场展现、各种学术观点博弈的平台。

1.1 李登辉时期“课纲”调整中的历史学者

台湾“解严”以后,台“教育部”提出“一纲多本”的教育政策,并于1990年开始主导修订课程纲要。1995年,台“高中课程纲要”修订完成并发布,拟于1999年秋季学期开始实施(由于当年为“中华民国88年”,该课纲又被称为“88课纲”)。其中历史组由吕实强和王曾才担任召集人,小组成员包括王仲孚、王寿南、李国祁、周樑楷、张元、张玉法、黄秀政、黄俊杰等历史学者。^②这些人员中,多为战后大陆迁台的“中国史”研究者,周樑楷、张元、黄秀政三人则出生于光复前后的台湾,具有强烈的本土意识,专门研究“台湾史”的学者则只有黄秀政。最后,在这份修订后的历史课纲中,“台湾史”首次从“中国史”中独立出来,形成单独的单元,但仍附属于“中国史”的课纲之中。^③

1996年10月,杜正胜接受台“国立编译馆”的邀请进行教科书编纂工作。他认为“88课纲”不符合台湾现状,因而提出“同心圆理论”,要求在建立“台湾国家认同”的基础上重新解释历史,以取代“中国史观”下的民族主义,将台湾的历史课程分为“乡土史”、“台湾史”、“中国史”、“亚洲史”、“世界史”等五个同心圆。^④该理论并未被台“教育部”和其他编纂学者接受。

1997年,台湾出版《认识台湾》教材,分为社会、历史、地理三册,“台湾史”首次独立成册出版,杜正胜担任社会篇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许雪姬、黄秀政、吴文星、张胜彦等台湾史学者则负责“历史篇”的编写。《认识台湾》一经出版即受到许多历史学者的反对,被认为是教育台湾年轻人“脱离中国人的意识”,“显然是为李登辉修宪的配套作业”,^⑤因应了李登辉的“本土化”理念,涉及“台独”和日本皇民史观。^⑥王仲

孚召集陈映真、蒋永敬、黄丽生、王晓波等历史学者在内的各界人士,撰写数十篇文章,汇集成《〈认识台湾〉教科书参考文件》,对《认识台湾》教科书展开批评。这些学者,多为具有较强民族情感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者。

1.2 陈水扁时期“课纲”调整中的历史学者

2001年9月,台湾开始试行“九年一贯”课程,整合小学和中学的所有课程,随即重新修订高中课程纲要。历史科课纲的修订由张元和周樑楷担任召集人,委员包括林丽月、邢义田、黄富三、周婉窈、黄清连、廖隆盛、李孝悌、吕芳上、陈国栋等人。^⑦这份课纲按照杜正胜的“同心圆理论”编排,高中一年级第一学期学习“台湾史”,第二学期学习“中国史”,二年级学习“世界史”,^⑧从而将“台湾史”从“中国史”的教学中彻底分离出来,并且把明朝中后期开始的“中国史”列入“世界史”中;在具体史实的用词上,也进一步“去中国化”,从而建构以台湾为主体的意识形态,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建构台湾人新的国家认同。参与这次课纲修订的委员中,前六位均为台湾主体意识较为浓厚的历史学者,其中黄富三和周婉窈的专长是台湾史研究,均十分推崇曹永和的“台湾岛史观”;林丽月积极推

① 台湾“教育部”:《高级中学课程标准》,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版,第89页。

② 台湾“教育部”:“修订经过:丙、本次修订高级中学课程标准之说明”,《高级中学课程标准(84年版,88学年至94学年度高一新生适用)》,1995年版,台湾“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官网。

③ 台湾“教育部”:“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高级中学课程标准(84年版,88学年至94学年度高一新生适用)》,1995年版,台湾“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官网。

④ 杜正胜著:“历史教育的改造”,《台湾心·台湾魂》,高雄:河畔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第140-142页。

⑤ 蒋永敬:“中日代理战争的危机已在台湾燃起”,台北:《海峡评论》,1997年8月号,第35页。

⑥ 王仲孚编:《为历史留下见证:〈认识台湾〉教科书参考文件》新编,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373页。

⑦ 台湾“教育部”:“普通高级中学课程暂行纲要修订经过”,《普通高级中学课程暂行纲要》,2004年版,台湾“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官网。

⑧ 台湾“教育部”:“普通高级中学必修科目“历史”课程纲要”,《普通高级中学课程暂行纲要》,2004年版,台湾“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官网。

动把“课纲”中“我国”的表述全部转换成“中国”；^①邢义田则主张从世界史的角度重新思考台湾历史研究。^②该课纲因受到台湾各界的猛烈抨击而暂停修订，张元也因此辞去召集人。

2004年，时任“教育部长”的杜正胜再次推动这份课纲，宣布于2006年开始使用，并要求成立历史科课纲修订小组，对课纲继续进行修订，预定2009年开始实施，故被称为“98课纲”。“98课纲”由周樑楷担任召集人，吴学明、蔡锦堂、廖隆盛、金仕起等台湾本土化意识浓厚的历史学者担任修订委员。^③随后，杜正胜委托认同台湾独立的台湾历史学会推动检核教科书用词，以台湾史学者戴宝村为教科书审核委员会召集人，改掉其中用词5000余处，使教科书全面“去中国化”。^④

1.3 马英九时期“课纲”调整中的历史学者

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台湾“教育部”开始成立专案小组，对“国文科”和“历史科”课纲进行调整。2008年10月27日，台“教育部”召开普通高级中学课程发展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会后，在王晓波提议下，台“教育部”组成研商高中课程纲要专案小组，对“国文”与“历史”课纲进行调整。专案小组召集人吴文星，委员包括王晓波、廖隆盛、吕芳上、黄秀政、周婉窈、王文霞、孙若怡、翁嘉声、周愚文等学者，以及李彦龙、蓝朝金、林桂玲、伍少侠、林秀蓉等五位高中老师。期间，因为意见不合，在“台湾史”研究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黄秀政中途退出，改由吕春盛取代。

2010年初，台“教育部长”吴清基改组专案小组。吕春盛和高中老师林桂玲被解聘，此外增聘九位委员，即汪荣祖、林满红、陈永发、黄克武、许雪姬、张胜彦、陈正国、杨国赐、张晓英，增聘委员多数出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要以中国史专家居多。期间，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周婉窈宣布退出。

2012年2月，蒋伟宁接任台“教育部长”。6月，台“教育部”安排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张亚中参与高中历史教科书的审定，引发“专业性”

与“非专业性”之争议。

2012年，“微调课纲”专案小组对外公布了修改后的“101课纲”。2013年，台“教育部”又以“错字勘误、内容补正及符合宪法之检核”为由，成立检核小组，对课纲进行“微调”。^⑤由于种种原因，台“教育部”迟迟不予公布“103课纲”检核小组成员名单，而根据台《自由时报》报道，台“103课纲”检核小组成员包括：世新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王晓波、佛光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大宁、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包宗和、台湾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朱云鹏、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昭瑛、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名誉教授董金裕、台湾师范大学东亚文化暨发展学系教授潘朝阳、台湾高雄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吴连赏、台湾海洋大学海洋文化所教授黄丽生、世新大学通识中心教授李功勤，并由王晓波担任小组召集人。^⑥“检核小组”之下依据学科又设四个分组，分别是：国文（陈昭瑛、谢大宁、董金裕）、历史（朱云鹏）、地理（潘朝阳、吴连赏）、公民（朱云鹏、包宗和）。朱云鹏以“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的身份担任检核小组之历史分组召集人，再次引发“专业性”与否的争议。

检核小组历史分组的组成，呈现三个特点：（1）学者的“统派”色彩明显；（2）没有专门从事“台湾史”研究的学者；（3）政治学者、经济学者参与历史课纲的检核。这份名单除了台湾固有的统“独”争议外，“非专业性”也是致命伤。

2014年1月27日，台湾当局尚未公布新“课纲”，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教授薛化

① 王仲孚：“《高中历史新课程纲要草案》何以如此荒谬”，台北：《海峡评论》，2003年11月号，第27页。

② 邢义田：“‘世界史’抑中国文化立场的‘西洋史’？”，台北：《史学评论》，1981年第3期，第133页。

③ 台湾“教育部”：“普通高级中学课程纲要修订经过：丙、本次修订普通高级中学课程之说明”，《普通高级中学课程纲要》，2009年版，台湾“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官网。

④ “黄智贤：扁朝检核教科书 制台独娃娃兵”，台北：《联合晚报》，2015年8月3日。

⑤ 台湾“教育部”：“普通高级中学国文与社会领域课程纲要微调之说明”，台湾“教育部”全球资讯网，2014年1月27日。

⑥ 邹景雯、黄以敬：“课纲调整案 10人检核小组操控”，台北：《自由时报》，2014年2月4日。

元即发起了“我们反对违背学术专业的微调课纲”的连署活动。连署声明指出,“微调”后的高中历史课纲“违背学术的专业性”,要求教育部门“撤回微调后的新课纲”。^①截至2015年6月3日,全台共有5390人参与连署,其中历史及台湾史相关系所(含“中央研究院”)共177位教授,包括“中央研究院”的台湾史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台湾政治大学的台湾史研究所、历史学系,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台湾师范大学的台湾史研究所、历史学系等全台历史或台湾史相关系所的学者,^②是台湾岛内第一次以历史相关学者为主的、参与人数最多的连署活动。

参与连署的学者多认为“微调”后的课纲过于偏向“中国史观”,部分“台湾史”学者认为,课纲大规模改写了台湾史教材,是针对“台湾史”而来,“模糊了台湾的角色,使学生错认台湾与中国是一体的。”^③张素玟指出,“微调课纲将‘日治’改为‘日据’、郑氏王朝改为明郑,虽看似一字之差,却抹减多年专业研究成果,将导致高中历史出现不符史实的内容”;^④许雪姬认为,“微调课纲”“忍无可忍”,“过去台湾史已是鲜少人研究的‘鲜学’,马英九执政后竟变成‘险学’,最终就是让中国统一台湾”。^⑤周婉窈作为“微调课纲”历史科修订小组2009年度委员,认为“软土深掘已经掘到岛屿的命脉”,是要“消灭台湾史”,为此,她连发多篇文章,批评台湾史课纲遭到“黑箱大改”,是“历史教育大复辟”。^⑥

综上所述,1987年“解严”以后,台湾高中历史课纲的调整始终受到台湾历史学者内部的分歧乃至对立的影响。随着台湾本土化的发展和台湾意识的高涨,历史课纲中的国家认同及统“独”意识始终成为争论的焦点。而作为历史课纲修订的参与者,历史学者为历史课纲赋予了价值判断及认同选择。李登辉政府的“88课纲”时期,虽然在课纲调整小组中存在大陆赴台学者与台湾本土派学者的拉锯,但由于大陆赴台学者人数占优,在他们的主导下,虽然“台湾史”形成四个独立的单元,从“中国史”中脱离出来,但依然附属于“中国史”的框架内,编订在同

一册历史教科书中。但是随后,在杜正胜等持“台湾中心史观”的历史学者、尤其是台湾史学者的把持和主导下,从《认识历史》到“同心圆理论”教科书,“台湾史”被一步步完全脱离“中国史”,并且在用词上全面“去中国化”,持有“中国史观”的学者则被“边缘化”。马英九上台后,开始推动“课纲”的调整,宣称要使课纲内容回到“宪法”的框架内,避免走向“台独史观”的叙述,但其检核小组却没有办法纳入“台湾史”学者,甚至引入非历史学专业学者来检核历史课纲,其捉襟见肘的窘况由此可见。

这场台湾历史学界对“103课纲”的纷争,从根本上反映出众多台湾史学者对于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的选择,也自然折射出台湾史研究学界的普遍“本土化”。

二、台湾光复后“台湾史”研究历程及其史观的嬗变

台湾光复以前,“台湾史”的研究者主要是日本学者,代表作有矢内原忠雄的《帝国主义下的台湾》、竹越与三郎的《台湾统治志》、井出季

① “我们反对违背学术专业的微调课纲”,连署活动网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3KMiN1HNv9c2SUrbi0DqmiMmLC74SYE5vImKZ7V_F0/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② 参与连署的学者包括:“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所长谢国兴、副所长刘士永及黄富三、林玉茹、许雪姬、翁佳音、吴敏人、詹素娟、张隆志、钟淑敏等17位研究人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黄进兴、副所长李贞德、林富士等10位研究人员,“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陈仪深等4位研究人员,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的薛化元所长及陈文贤、戴宝村、李福钟等8位学者,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的郑钦仁、吴密察、李永炽、陈翠莲、李文良、吕绍理、周婉窈、吴文星等10位学者,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史研究所的张素玟所长及蔡锦堂、许佩贤等5位学者,以及成功大学、东吴大学、淡江大学、中兴大学、台北教育大学、暨南国际大学、东华大学、辅仁大学、台南大学、长荣大学等历史或台湾史相关系所的所长或主任,还有张胜彦、黄秀政、郑梓、张炎宪、李筱峰、郑丽玲、郑瑞明、王泰升等知名台湾史学者。

③ “课纲微调无异历史巨变”,台北:《民报》,2015年2月22日。

④ “140学者连署 促撤黑箱课纲”,台北:《自由时报》,2014年3月10日。

⑤ 同④。

⑥ 周婉窈:“新政府拨乱反正? 还是历史教育大复辟——高中历史课纲要改成怎样,请大家来关心!”,高雄:《南方电子报》,2010年2月10日,<http://enews.url.com.tw/south/56491>。

和太的《台湾治绩志》等。虽然也有台籍知识分子出于民族自觉意识和对殖民统治的反对,开展“台湾史”研究,但影响力较大的成果仅有连横的《台湾通史》。

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在国民党“中国史观”的强势主导下,台湾历史学界以研究“中国史”为主,“台湾史”是极为边缘的领域,仅有少数学者稍有涉猎。“台湾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科,而是以“台湾省通志”的形式存在,其研究领域则多集中于对台湾风土民俗的介绍、研究。1971年台湾被驱逐出联合国、台湾丧失在国际上的中国代表权,台湾历史学者开始思索自我身份的认同,“台湾史”研究才逐步得到发展。1987年台湾“解严”以后,摆脱政治束缚的“台湾史”得以较大发展,同时也不断陷入统“独”史观的交错与挣扎。纵观台湾光复后的“台湾史”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2.1 “台湾史”研究“鲜学”期:“中国史观”主导学界话语权

1945年至1970年代初期,是台湾“台湾史”研究的“鲜学”期。

1945年台湾光复尤其是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台后,许多大陆历史研究机构和知名学者相继迁赴台湾,迅速掌控台湾历史学界的话语权。他们大多擅长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所以长期占据台湾历史学研究的主流,“南港学派”^①是其杰出的代表。这些大陆学者中虽然也有对台湾史稍有涉猎者,如郭廷以、朱云影等,以及他们的“学生辈”李守孔、张朋园、张玉法、李国祁、王曾才、胡春惠、陈永发等历史学者,但他们的研究专长仍然是“中国史”,其研究精力主要在“中国史”。

这一时期,大陆赴台学者的台湾史研究成果主要有:1946年,汤子炳印行了《台湾史纲》,这是战后第一本台湾史研究专著。这部书从两岸民族情感出发,叙述了隋唐时代至光复时期台湾各政权的发展。^②之后还有张其昀的《台湾史纲》(1950)、方豪的《台湾民族运动小史》(1951)、郭廷以的《台湾史事概说》(1954)、姜子匡的《台湾民俗文艺试论》(1962)、黄嘉谟的

《美国与台湾》(1966)等,均是大陆赴台学者对战后早期台湾史研究的贡献。郭廷以在《台湾史事概说》中首次提出“内地化”概念,他认为“台湾的制度建设、文化推广等均是源自中国的系统,阐扬中国与台湾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③1975年,郭廷以的弟子李国祁提出“内地化”理论,解释清代台湾汉人社会的发展模式。他认为清代末期台湾出现了与中国各省“完全相同的社会形态与文化”,并从实证的角度证明台湾与中国传统社会是融为一体的。^④

台湾本土的台湾史研究学者首推杨友濂(笔名杨云萍)。虽然他没有留下通史性台湾研究著作,但是作为战后台湾史研究的先行者,他为台湾史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46年8月,杨云萍接受时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大陆赴台学者许寿裳的聘请,担任该馆的编纂以及台湾研究组组长,开始台湾史的编著工作。同时,他还担任台湾文化协进会机关刊物《台湾文化》以及《台湾风物》的主编,所以常有台湾史研究的文章问世。^⑤1947年8月,在许寿裳的推荐下,杨云萍出任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并开设全台第一个“台湾史”课程,这也是其后近三十年间,全台唯一的“台湾史”课程。^⑥期间,台湾还没有独立的台湾史研究领域及学科,一般被

① “南港学派”指早年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为代表的学派,由于近史所的地理位置在台北市南港区而得名。近史所由历史学家郭廷以创建,是时被聘用者多为郭廷以的故交或门生,故形成以郭廷以为首的“南港学派”,对台湾历史学界影响深远。学派第一代学者包括郭廷以、张贵永、陶振誉、杨绍震、王聿均、黄嘉谟、李毓澍等七人,之后的学者包括贺凌虚、吕实强、李国祁、张玉法、张朋园、陈三井、王萍、林明德等人。参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南港学风: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

② 高明士主编,林玉茹、李毓中编著:《战后台湾的历史学研究:1945-2000(第七册:台湾史)》,台北:“国家科学委员会”,2004年版,第6页。

③ 鲍绍霖、黄兆强、区志坚主编:《北学南移:港台文史哲溯源(文化卷)》,香港:秀威资讯,2015年版,第302页。

④ 李国祁:“清代台湾社会的转型”,台北:《中华学报》,1987年7月,第131页。

⑤ 张羽:“光复初期台湾知识分子文化认同问题研究——以杂志《台湾文化》为中心”,北京:《台湾研究》,2011年第1期,第50页。

⑥ 许雪姬:“杨云萍教授与台湾史研究”,台北:《台大历史学报》,2007年6月,第30页。

放在中国古代史或近现代史的研究之下。曹永和、王世庆两位自学出身的学者,长期承担台湾文献调查和历史研究的工作,也成为战后台湾史研究的开拓者。戴炎辉、陈绍馨、陈奇禄等台湾学者的成果,也常见于《台湾文化》《台湾风物》等刊物上。

这个时期,值得关注的是台湾史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具有较大的进展。1948年,台湾省通志馆^①(后更名为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在台北成立,专门负责台湾文献的收集、整理、编纂和出版,林献堂、黄纯青、林熊祥等人先后担任该会主任委员。^②文献会不仅负责对原始资料的搜集,还出版了当时官方唯一的台湾研究的季刊——《台湾文献》。1950到1960年代,在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大陆赴台学者周宪文的主持下,台湾银行研究室搜集各类台湾史料,出版了《台湾文献丛刊》《台湾研究丛刊》等,为台湾史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但是研究性文章较少。^③

此外,一些海外“台独”人士开始撰写“台湾史”著作,试图掌握“台湾史”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其成果包括: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1962)、王育德的《台湾,苦闷的历史》(1964)以及黄昭堂的《台湾民主国的研究》(1970)等。

2.2 “台湾史”研究“萌动”期:“中国史观”遭遇挑战

1970年代初至1980年代后期,是台湾“台湾史”的“萌动”期。

这一时期,大陆赴台历史学者的研究重点仍然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他们的研究方法和史观仍然对台湾历史学界包括台湾史研究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他们培养的学生虽然仍以中国史研究为主,但也有部分开始转向台湾史研究,如张胜彦、温振华、李筱峰、林满红、蔡慧玉等。这一时期,黄大受的《台湾史要略》(1977,后更名为《台湾史纲》)、程大学的《台湾开发史》(1978)可视为代表作。

而一大批台湾本土的“台湾史”学者也在兴起,如吴文星、黄秀政、陈翠莲、周婉窈、翁佳音等人。新一代的台湾史学者多出生于光复后,

对台湾本土的认同感较强。1971年台湾当局被驱逐出联合国后,这批年轻学者的本土意识也逐渐崛起,进一步推动了台湾的“台湾史”研究向“本土化”方向发展。

1972年,在旅美考古学者张光直的推动下,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开展“台湾省浊水大肚两溪域自然与文化史科技研究计划”(简称“浊大计划”),结合人文和自然的各领域学者,探讨浊大流域古今居民的历史及其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④1975年,参与这项计划的陈其南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展现了“土著化”理论的雏形,由此开始了台湾史学界对于“内地化”和“土著化”的论战。“土著化”理论认为清代汉人移民到台湾后,对台湾产生认同感,同中国大陆产生疏离,不再以大陆的祖籍作为自我身份认同的标准,并逐步成为一个土著化的社会,由此强调台湾与大陆间的断裂性。^⑤这场论战掀起了台湾史学界第一次对传统中国史观的挑战,在台湾史领域影响甚大。

1980年代以后,台湾的“台湾史”学者开始抛弃“中国史观”,试图以台湾为主体展开历史叙述,“台湾史”研究学界开始出现以台湾为中心的历史叙述方式。吴密察的《台湾通史:唐山过海的故事》(1982)最为典型,该书虽然以连横的纪传体《台湾通史》为构架,但强调摆脱过去的中原文化和民族革命的历史叙述,宣称构建了“一部全新的台湾史”。^⑥同时,黄富三、吴密察、李筱峰等人开始重新评估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希望从中找到日本对形成台湾现代认

① 1949年7月,台湾省通志馆改组为台湾省文献委员会。2002年,文献会开始隶属于“国史馆”,更名为“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参考“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官网, http://www.th.gov.tw/new_index/pages/a/a_01.php。

② 参考“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官网:“沿革与展望”,同①。

③ 许雪姬:《台湾史研究三部曲:由鲜学经显学到险学》,台北:《思想》,2010年第16期,第84页。

④ 张光直编:《台湾省浊水溪与大肚溪流域考古调查报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7年,第2页。

⑤ 陈其南:《台湾本土意识的形成及其含意》,黄康显编:《近代台湾的社会发展与民族意识》,香港: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1987年版,第89-98页。

⑥ 吴密察著:《台湾通史:唐山过海的故事》,台北:时报文化,1987年版,第8页。

同的影响,从而减少对“中国史观”的依赖。1986年,张光直等人集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资源,进行台湾史田野研究工作计划,希望将“台湾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进行研究。

2.3 “台湾史”研究“快速发展”期:“中国史观”被彻底边缘化

1980年代后期至今,是台湾“台湾史”的“快速发展”期。

1987年,随着“解严”后台湾意识形态和言论自由的松绑,众多台湾史研究人员和成果不断涌现,“台湾史”研究成为台湾本土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台“中央研究院”、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的“台湾史”研究所相继成立,成为三个“台湾史”研究的重镇,也培养了一大批“台湾史”研究的专业人才。此外,在历史学硕、博士论文中,“台湾史”研究的论文达到三成以上,足见台湾史研究在台湾历史学界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①

这一时期,老一辈的大陆赴台学者相继退出历史学界,曹永和、王世庆以及许多中生代本土学者逐渐掌控台湾史领域的话语权。这些中生代本土学者纷纷跳脱“中国史观”,各类以台湾为中心的史观层出不穷,其中主要包括将台湾史作为“本土史”而不是中国地方史的“后殖民史观”、“社会史观”等。尤其是1996年“总统直选”后,李登辉在台湾全面推动“去中国化”,“台独史观”、“皇民史观”、“偏安史观”(又称“独台史观”)等“分离史观”,作为“去中国化”的工具,在台湾史学界大行其道。

追本溯源,这些史观都是“台湾中心史观”的具体阐释,它们以台湾岛作为历史的起点,认为历史上的治理者都是“进进出出的过客”,所有台湾“总统直选”前的治理者都是外来政权。^②在“台湾中心史观”中,最为典型的的就是“台湾岛史观”。

1990年,曹永和提出“台湾岛史观”,他认为“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历史舞台,从史前时代起,便有许多不同种族、语言、文化的人群在其

中活动,他们所创造的历史,都是这个岛的历史。”“在台湾岛的基本空间单位上,以岛上人群作为研究主体,纵观长时间以来台湾透过海洋与外界建立的各种关系,及台湾在不同时间段落的世界潮流、国际情势内的位置与角色,才能一窥台湾历史的真面目。”^③

“台湾岛史观”被认为开启了“以地范史”的不同路径,深刻影响了之后二十余年的“台湾史”研究,几乎成为“台湾史”学界的主流史观,成为1980年代以来“台湾史”研究的两项重要特征之一。^④周婉窈在“台湾岛史观”的基础上,通过台湾岛的山、海、平原三个以人群活动为主的构成要素和空间舞台,以台湾为主体思考台湾历史,重新构建台湾历史的研究。她出于台湾主体意识的思考,提出“谁的历史”的问题,认为“新的时代要求新的历史;新的族群关系要求新的族群史”,“一个国家,或一个希冀成为国家的社会,需要‘自己’的历史”,^⑤将台湾历史与台湾现实政治链接的意图和倾向十分明显。

1997年,杜正胜在“台湾岛史观”的基础上,把“台湾”、“中国”、“亚洲”、“世界”描述成由内而外的几个同心圆,强调由内而外的台湾主体性,被称为“同心圆理论”。“同心圆理论”对“台湾史”研究影响颇大,甚至被作为编写高中历史教科书的指导性框架,它更进一步地将“台湾史”从“中国史”中独立出来,“去中国化”的政治意味十分浓厚。

随着这种“新史观”的传播,台湾本土史逐渐取代中国史成为研究的主流,“台湾史”研究越来越强调台湾主体意识,台湾各地的乡土史

① 彭明辉:“台湾地区历史研究所博、硕士论文取向:一个计量史学的分析(1945-2000)”,《台湾史学的中国缠结》,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版,第163页。

② 石之瑜:“台湾中心论需接受检验”,台北:《中国时报》,2015年7月1日。

③ 曹永和:“台湾史研究的另一个途径——‘台湾岛史’概念”,《台湾早期历史研究续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449页。

④ 张隆志:“当代台湾史学史论纲”,台北:《台湾史研究》,2009年第4期,第173页。

⑤ 周婉窈著:《台湾历史图说》,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4、6页。

以及地域史成为研究的重点,多族群的研究成为发展的趋势,其中也不乏将“台湾主体意识”导向“台独意识”的学者。1995年,台湾历史学会成立,该会成员均认同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并以建立以台湾为主体的历史观为宗旨,张炎宪、戴宝村、薛化元、温振华、陈君恺等台湾本土意识浓厚的“台湾史”学者均担任过理事长一职,李永炽、张胜彦、郑钦仁、吴密察、林明德、周梁楷、李筱峰、王泰升、詹素娟、李福钟、蔡锦堂、李明仁、许雪姬、曾士荣、吴文星、吴政宪、洪丽完、翁佳音、林果显、陈仪深、林呈蓉、何义麟、施志汶等一大批台湾史学者都曾是该会的通讯撰稿人,足见其在台湾史研究领域的影响力。^①

这些学者大多越过光复后赴台大陆学者的研究方法、路径和成果,直接接续日据时期日本学者的“台湾史”研究,追随其“殖民地肯定论”,企图将台湾的现代化归功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以贬低清廷和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从而塑造脱离中国的台湾认同。比如吴文星就在《认识台湾·历史篇》中着重介绍了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的正面意义,包括促成了人口的激增、放足断发的普及、守时观念的养成、守法观念和现代卫生观念的建立等,同时对殖民统治造成的伤痛少有论及。^②

至此,在台湾的学术研究领域,“台湾史”已完全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台湾中心史观”及其衍生史观如“后殖民史观”、“社会史观”、“偏安史观”(又称“独台史观”)、“台独史观”等成为该学科的指导史观,“中国史观”被彻底边缘化。

三、台湾“台湾史”研究谱系的流变 直接影响到史观的变化

1945年光复后台湾的“台湾史”研究史观“中国史观”的盛行、衰弱、“边缘化”,“台湾中心史观”从无到有、从“边缘”到占据“台湾史”研究的主流,变化不可谓小,政治环境的变化是其重要原因,而台湾“台湾史”研究谱系的流变则直接影响到史观的变化。

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为了消除日本殖民统

治的影响,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推行民族主义教育,以“三民主义”为指导进行文化的重建,宣扬国共对抗“二元对立”的中国国族史观,强调台湾与大陆的关联性。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蒋介石政权把台湾作为反攻大陆的据点,更是无暇顾及对台湾本土历史的了解。同时,为了强化统治的合法性,构建“自由中国”的国族想象,以凸显其相较于大陆“红色政权”的正统代表性,国民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极为重视,在历史教育中着力强化“中国史”,将“台湾史”视为“中国史”的延伸。在“戒严体制”下,台湾当局对历史学者查阅的档案资料进行严格的审查,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和出版受到管制。为了遏制台湾意识的萌发,“台湾史”研究受到的制约尤甚,这直接造成了台湾的“台湾史”研究的空洞化。

1971年以后,随着台湾当局被驱逐出联合国,台湾人的本土意识逐渐崛起,“台湾史”研究成为学者开始关注的热点。1980年代尤其是“解严”后,台湾政治环境有所松动,台湾当局对史观的束缚也有所放松,“中国史观”开始受到挑战。李登辉上台后,极力鼓吹“台湾意识”、“台湾命运共同体”和“文化新中原”,对台湾进行重新定位,为主张台湾主体性的“台湾史”学者提供了现实条件。随着1990年代中期台湾政治民主化的转型和台湾当局“去中国化”的推行,台湾人的本土意识迅速提升,很多台湾本土的台湾史学者急于完全跳脱“中国史观”,建立以台湾为中心的史观,重新对台湾史进行叙述。

除了上述政治环境的变化外,台湾史学界从“中国史观”向“台湾中心史观”、“台湾本土史观”的蜕变,与光复后“台湾史”研究谱系的嬗变——继承与断裂密不可分。

台湾光复后“台湾史”研究的谱系大致如下。

3.1 大陆赴台学者及其传人

台湾光复后,许多大陆的史学研究机构和

^① 参考《台湾历史学会通讯》,台北:台湾历史学会官网,http://www.twhistory.org.tw/index.html。

^② 杜正胜主编:《认识台湾·历史篇》,台北:“国立编译馆”,1999年版,第76-80页。

学者迁赴台湾,对战后台湾的历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悉数迁往台湾,国民党党史馆、“国史馆”相继在台湾复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也在郭廷以的推动下正式成立。这几个史学研究机构成为战后台湾史学研究的中坚力量,掌控着台湾历史学界的话语权。许多大陆知名历史学者迁赴台湾,如许寿裳、沈刚伯、郭廷以、傅斯年、胡适、董作宾、朱云影等人,这是战后台湾历史学界第一代学者。他们多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见长,被称为“大陆史料学派”。他们之中也有不少人关注台湾史研究,有一些著述(见前文),并培养了一批研究“台湾史”的学生,如郭廷以培养了李守孔、张朋园、林明德、张玉法、李国祁,朱云影培养了郑瑞明、王曾才、胡春惠、陈永发等。这是战后台湾历史学界第二代学者。

1980年代以后,这批怀有深刻民族情感的大陆迁台学者相继退出学术舞台,他们培养的学生大多专注于中国史的研究,但也有一些学生投入台湾史的研究。如李守孔的弟子张胜彦、张朋园的弟子温振华、张玉法的弟子李筱峰、李国祁的弟子林满红、王曾才的弟子蔡慧玉、林明德培养的吴文星、黄秀政、戴宝村等。而师从许倬云的杜正胜虽然研究专长是中国古代史,但是涉猎颇广,其培养的学生也有从事台湾史研究者,例如曾任台湾历史学会秘书长、理事长的陈君恺。这是战后台湾历史学界第三代学者。

3.2 台湾本土学者及其传人

1983年,作为“台湾史”研究的第一代台湾本土学者杨云萍指导了全台第一位“台湾史”博士研究生——许雪姬,她的博士论文《清代台湾武备制度的研究:台湾的绿营》介绍了清代治台的班兵制,即清廷每三年从福建调兵至台湾,用以加强对台湾的防御。除许雪姬外,杨云萍还指导了黄富三、张炎宪、林瑞明、陈秋坤等台湾史学者,这些学者日后都成为“台湾史”研究的重要人物。

同为“台湾史”研究的第一代台湾本土学者、曹永和、黄富三等人,也培养了一批“台湾史”研

究者,如陈翠莲、周婉窈、翁佳音等人。新一代的台湾史学者多出生于光复后,对台湾本土具有强烈的认同感。1971年台湾当局被驱逐出联合国后,这批年轻学者的本土意识进一步崛起和强化。

1987年,随着“解严”后台湾意识形态和言论自由的松绑,众多台湾史研究人员和成果不断涌现,“台湾史”研究成为台湾本土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台“中央研究院”、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的“台湾史”研究所相继成立,成为三个“台湾史”研究的重镇,也培养了一大批台湾史研究的专业人才,如钟淑敏、吴学明、张隆志、李文良、刘士永、詹素娟、林玉茹、张素芬、林文凯、曾文亮、陈君恺、陈佳宏等。

3.3 海外“台湾史”学者及其传人

1945年以后,在台湾史研究领域,最早对国民党政府的中国史观提出挑战的,是一些活跃于海外尤其是日本的台湾人,如史明、王育德、黄昭堂等,他们留下了许多“台独”色彩鲜明的台湾史著作。许多留学日本的台湾学生深受其思想的影响,其中就包括后来从事台湾史研究工作的李永炽、吴密察等人,他们回台以后相继成为“挑战中国国族论述和倡导台湾史研究的先进人物”。^①

而1945到1980年间,由于处于“戒严”体制,台湾的历史学研究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学术发展出现了断层,致使一大批青年研究者赴海外深造,其中不乏“台湾史”研究者,如林满红、李孝悌、陈秋坤等人。1970年代以后,这批台湾史研究者相继回台任教,他们希望跳脱传统中国史学的框架,寻求台湾本土史学的建立和体系化。

西方史学传统也对台湾史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49年以后,在冷战形势下,许多西方学者将台湾作为“中国社会文化研究的实验室”,他们把社会科学理论、田野研究和历史文献相结合,为台湾的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②美国的新史学派、法国的年鉴学派、

① 王晴佳:“当代台湾历史论述的双重挑战”,台北:《思想》,2006年第2期,第120页。

② 陈绍馨:“中国社会研究的实验室——台湾”,《台湾的人口变迁与社会变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2页。

英国的新社会史学派不断冲击着台湾史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对台湾史研究的史观变化也起到了推动作用。西方学者还通过基金会的形式与台湾学者展开密切合作,“浊大计划”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在这个谱系中,不同流派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史观冲突,“内地化”与“土著化”的史观争论,就是其典型代表。

1975年,郭廷以的弟子李国祁提出“内地化”理论。该理论认为,清代以来台湾移民社会的变迁是以中国大陆的社会形态为目标的,李国祁通过对宗族制度的联结、宗教信仰的统一、经济活动的北移、文化制度的影响、先贤的努力等实证研究,证明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联结。^①同年,“浊大计划”的参与者陈其南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则展现了“土著化”理论的雏形。“土著化”理论认为,清代汉人移民到台湾后,对台湾逐渐产生了认同感,从而与中国大陆之间产生疏离,不再以大陆的祖籍作为自我身份的认同,并逐步成为一个土著化的社会,形成新的对台湾本土的认同。^②此后,众多台湾本土历史学者不断提出以台湾为中心的史观和研究方法,如“台湾岛史观”、“后殖民史观”、“社会史观”等,也都是出于对台湾本土认同的史观阐释。

这场争论,使得一些学者的“史观”转向,如曹永和,早年他也奉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它的历史,在文化上讲,一直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的”^③,后来他则积极提倡“台湾岛史观”。

令人深思的是从大陆赴台历史学者析出的第三代“台湾史”学者,如前文提到的张胜彦、温振华、李筱峰、蔡慧玉、黄秀政、戴宝村等,多为土生土长的台湾人,经历过“二二八事件”和国民党威权统治,见证了国民党政权对党外人士的打压和排挤,以及对学术研究的干涉和管制,对国民党“党国机器”下所灌输的“中国史观”和中华民族主义心存芥蒂,于是开始“迈出史学上与正统论述决裂的第一步”,试图抛开国民党政府所传输的意识形态,^④期望从对本土历史的研究中寻求自我身份的认同。

这不免导致学生与导师在史观等理念上的

矛盾和冲突。“98课纲”的修订,由周樑楷担任召集人,吴学明、蔡锦堂、廖隆盛、金仕起等台湾本土化意识浓厚的历史学者担任修订委员^⑤,“台湾史”被完全从“中国史”中剥离出来。课纲修订完成后,周梁楷和黄清连的老师、大陆迁台学者逯耀东先生发表公开信,以儿歌“雪人不见了,雪人没有手也没有脚,雪人为什么不见了?”叹惜课纲的修订未能坚持“历史的尊严”,认为该“课纲”是“遵从某人的意旨,闭门造车将历史裁减得柔肠寸断”,^⑥导致师徒反目。由此可见,坚持“中国史观”的学者的“衣钵传承”出现障碍甚至“断链”,已是事实。

四、结 语

1987年台湾“解严”以前,“中国史观”在台湾历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解严”后,随着台湾当局对意识形态和言论自由的松绑,“中国史观”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台湾中心史观”开始受到关注,但两种史观仍然处于拉锯状态。随着1990年代末期台湾“本土化”和“去中国化”的推动,台湾人的本土意识迅速提升,台湾的“台湾史”学者急于摒弃“中国史观”,建立以台湾为中心的史观,重新对台湾史进行叙述。彼时,“台湾史的研究与教学,已经变成当前台湾政治的一个重要部分,成为呼吁独立建国的一个主要论述。”^⑦从大陆赴台的老一辈历史学者逐渐

① 李国祁:“清代台湾社会的转型”,台北:《中华学报》,1987年7月,第131-159页。

② 陈其南:“台湾本土意识的形成及其含意”,黄康显编:《近代台湾的社会发展与民族意识》,香港: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1987年版,第89-98页。

③ 黄富三、曹永和主编:《台湾史论丛(第一辑)》,台北:众文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1页。

④ 莫达明:“台湾本土史学的建构与发展(1972-2004)”,台北:《思想》,2010年第16期,第52页。

⑤ 台湾“教育部”：“普通高级中学课程纲要修订经过：丙、本次修订普通高级中学课程之说明”，《普通高级中学课程纲要》，2009年版，台湾“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官网。

⑥ 逯耀东：“雪人已融——给周梁楷、黄清连的信”，台北：《联合报》，2004年11月13日，A15版。

⑦ 王晴佳著：《台湾史学五十年（1950-2000）：传承、方法、趋向》，台北：麦田出版，2002年，第xvii页。

凋零,以及在台湾政治环境的扭曲下,学术谱系传承不继,造成了《认识台湾》的独立成册,以及“98课纲”的推行,“台湾史”被一步步地完全脱离中国史。2008年马英九上台以后,为了调整李登辉、陈水扁时期留下的“台独”课纲,召集学者对课纲进行“微调”,试图使其回到“宪法”的框架内,却引发全台众多“台湾史”学者的反对,可见“台湾中心史观”已成为台湾史学界的主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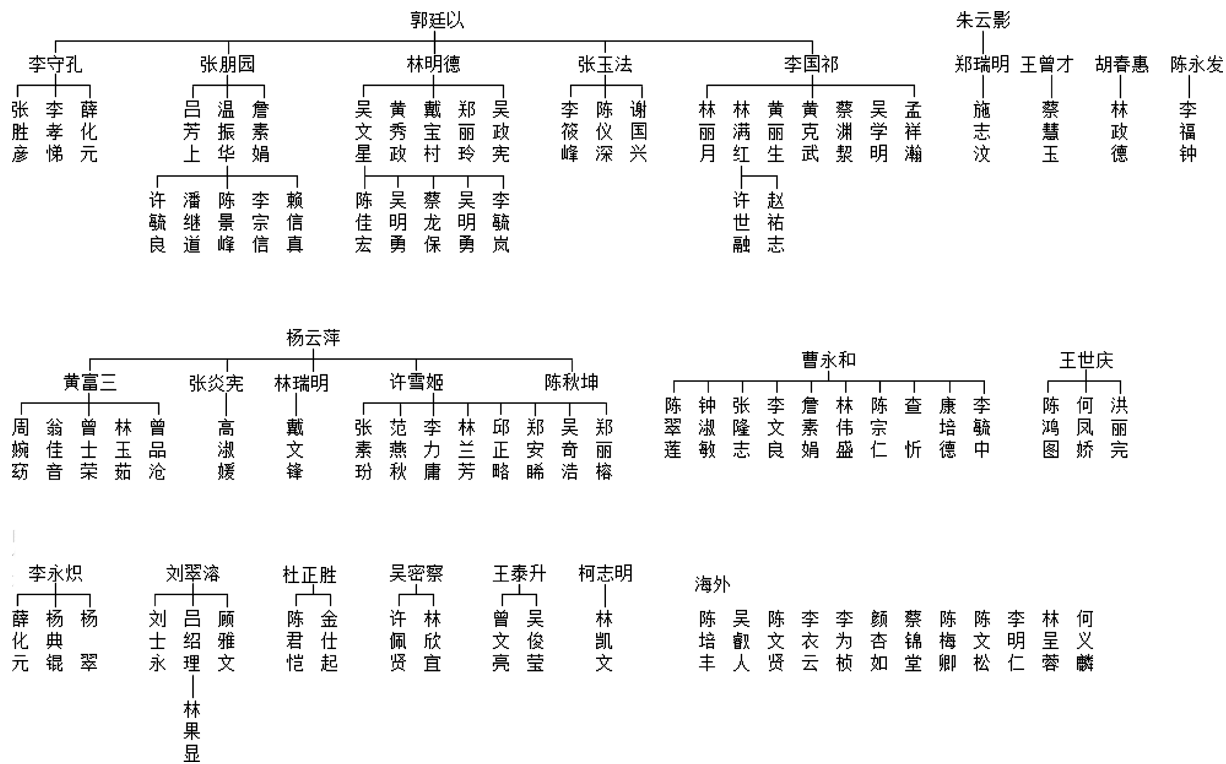
“台湾史教学与研究的广泛开展,本身反映了台湾人历史、认同意识的转化,同时这些教学与研究的开展,又促使台湾民众与知识界更深入地考虑认同的问题。”^①台湾的“台湾史”学界在史观上的转化,通过学术出版品、高中历史课

纲和教科书等形式,对如今台湾社会历史记忆、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台湾的起源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岛”的地理概念,台湾人最初也并不是从台湾岛上自发产生的,“台湾史”不应该也不可能独立于“中国史”之外。台湾某些政治人物为了达到推动“台独”目的,在“台湾史”的研究、教学领域兴风作浪。历史学者应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实证研究,客观地叙述长久以来台湾所处的环境和地位,以免造成研究的偏见与偏执,不但违背自己的良知和学术精神,而且给台湾社会造成巨大的认同错乱和纠葛。

编辑 邓文科

附:台湾史学者谱系图(作者自制)



① 王晴佳著:《台湾史学五十年(1950-2000):传承、方法、趋向》,台北:麦田出版,2002年,第126页。

The Pedigree of Taiwan Scholars in Taiwan History Research and the Evolutions of Their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ZHANG Meng¹ LIU Xiangping¹

(1.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On February 10, 2014, Taiwan authorities brought out the new high-school Chinese and Social Studies curriculum outlines, which was called “103 Curriculum Outline”. The curriculum outlines sparked widespread controversies, and the essence of which is the controversy of two kinds of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that is “China-centere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Taiwan-centere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t first, the field of history in Taiwan was led by “China-centere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it was gradually challenged and “marginalized” soon afterwards. At last, “Taiwan-centere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revailed, which led to the “localization” of Taiwan history research, behind which there are some complex and profound political and social reasons. The inheritance and rupture of the pedigree of Taiwan history research directly influence the evolution of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high-school history curriculum outline, which is worthy concerning and pondering.

Key words: history curriculum outline of Taiwan; pedigree of Taiwan history research;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na-centere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aiwan-centered historical perspective”